

唐力行

微学研究论稿

唐力行著



南京大學出版社
The Commercial Press

唐力行

微学研究论稿

唐力行 著

 商务印书馆
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力行徽学研究论稿 / 唐力行著 ; 一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2012

ISBN 978-7-100-09597-6

I . ①唐… II . ①唐… III . ①徽州地区—文集 IV . ① K92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057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唐力行徽学研究论稿

唐力行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9597-6

2014年5月第1版 开本 890×1240 1/32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6.5

定价：120.00 元

自序

我从事徽学研究已有三十余年了，从那时起一路走来，陆陆续续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不知不觉间已年近七十了。承商务印书馆不弃，这些论文将结集出版。借此机会，回首往事，自序如下：

一、从徽商研究入手，进入区域社会研究的学术领域

提起我与徽学结缘，不能不感谢我的老师洪焕椿教授。在选择专业方向时，我重回母校求教，先生建议我就近选择既有地方特色又有重大学术意义的明清徽商为研究课题。但是徽商研究起步早，知名学者傅衣凌教授以及日本根岸佶教授、藤井宏教授等早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便对徽商作了开拓性研究。因此，这一课题的起点高，有相当的难度。我感受到先生要我走的学术之途是艰难的，但惟其艰难，反而激起我浓厚的兴趣和探索的欲望，从而与徽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所写的第一篇徽商论文是《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系与张海鹏先生合作的，发表于《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在撰写《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时曾多次引用该文的观点和资料。论文所产生的影响，无疑对我是一个鼓舞。但实际上我从余英时教授那里学习到的东西更多。我对徽州文化的研究就是受余教授关于宋代新儒家伦理中“彼世”与“此世”观念转变的启迪。上文是为1983年11月举办的明代经济史学术讨论会准备的。这是改革开放后明史学界举办的第一次重要学术会议，笔者出席这次会议，是由会议主办者之一洪焕椿先生推荐的。在会上，我有机会聆听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明史研究室主任、著名学者王毓铨教授的讲话，他提出了研究区域史的主张，指出区域史的研究是国际史学发展的新趋势。区域史的研究可以深化中国整体史的研究。过去我们的研究集中在中央王朝的兴衰和典章制度方面，很少考虑中央和地方的相互作用。其实各区域因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与中央王朝空间距离及交通难易的不同、传统与风俗的不同、地理物产与民族构成的不同等因素，它们对中央政令的执行和变异程度会有相当大的差异。中国疆域辽阔，只有把一个个区域社会的历史研究透了，才能从中央和地方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把整体中国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毓铨先生的这席演讲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在研究徽商的过程中，随着史料的积累和思考的深入，我逐渐感觉到徽商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徽商研究的视野必须拓展。徽商能在明清时期执商界牛耳数百年，其缘由是复杂多元的，但首要的是与其生长的土壤相关。因此我将徽商研究拓展为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的研究，而这一拓展又是与当时的学术潮流即社会史的兴起相合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在我国蓬勃兴起，学者们以整体史的新视野

重新审读历史,不再满足于政治史和精英史,而是将目光向下,关注长时段的文化、心态、习俗、信仰、仪式、组织、结构、区域、普通人的生活、地方社会对国家的制衡等等。而这些长期被忽略的历史要素大多是沉淀于具体的区域社会中的。因此,社会史的研究必然导向区域史研究。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1985年为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撰写的《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一文中,就贯注了我的这一思考。在与会的一百多篇论文中,此文是唯一为《历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选用的论文。这一习作受到学界的好评,归根到底是顺应了学术潮流。

怎样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这是需要我们在一个个具体而微的研究中进行思考的。区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每一个特定的区域总是有其疆界的,而疆界又与区域之自然地理环境大致对应。徽州的自然地理环境是以山区为主,“本府万山中,不可舟车,田地少,户口多,土产微,贡赋薄”¹;“其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焉”。²所以,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二十》中说徽州疆界的特征是“徽郡保界山谷”。道光《徽州府志》卷1《地理·形势》记述了疆界的四至云:“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阨。”徽州府下辖的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便在这“险阻四塞”的疆界之内。多山的地理环境赋予徽州区域以特定的气候、物产、交通、经济、乃至人文景观。徽州区域史研究是以该区域的整体历史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因此,举凡该区域曾经出现过的人

1 弘治《徽州府志》卷2《食货一》。

2 方弘静:《方氏家谱序》。

以及因人的活动而形成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事物均属其研究范畴。举其大端则有经济方面的商人、土地制度等；文化方面的方言、文书、教育科举、民居园林、地方戏曲等；社会方面的宗族制度、民间组织、风尚习俗、社会生活、社会分层、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等。那么，是不是我们将区域内所有的人和事一一研究过来，它们的总和就是区域整体的历史呢？显然这是做不到的，即便能做到也是与我们整体史的概念大异其趣的。

这里，要充分注意的是系统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整体不是局部相加之和，整体大于局部相加之和。因此，当我们研究区域时，首先要将该区域的要素（即局部）提炼出来，从局部与局部以及局部与整体的互动中来揭示区域的整体特征。以徽州而言，它与一般的、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区域社会不同，是一个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对完整的区域社会。经过多年的研究，我们发现徽州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造成了经济上的徽商、社会上的宗族组织与文化上的科举理学这三个富有特色的要素。¹在经济方面，康熙《休宁县志》就徽商的兴起论说道：“徽州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赡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而商之通于徽者取道有二：一从饶州鄱、浮，一从浙省杭、严，皆壤地相邻，溪流一线，小舟如叶，鱼贯尾衔，昼夜不息。一日米船不至民有饥色，三日不至有饿莩，五日不至有昼夺。”²在社会方面则是宗族制度最为严密。被群山封锁与外界隔绝的徽州是一个避乱的理想世界，避乱是徽州移民的第一位原因。根据我对《新安名族志》的统计，中原士族向徽州的迁徙，主要分布在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宋元，这三个时期正是中原地区战祸连天，社会动荡，北方人民南

1 参拙著《徽州宗族社会》，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

2 康熙《休宁县志》卷7《汪伟奏疏》。

迁的三次高潮。而其中唐末五代移民人数最多,占54%。从移民的原因来看,不明原因的始迁约占29%,而因战乱和“爱山水清嘉”者达52.3%,占一半以上。可见,因动乱而凸显的地理要素是历史上世家大族迁徙徽州的最为重要的原因。这些世家大族在群山怀抱的谷地中定居下来,将古代中原地区消失了的宗族制度保存下来。汪道昆《太函集》云:“新安多世家强盛,其居室大抵务壮丽,然而子孙能世守之,视四方最久远,此遵何德哉!新安自昔礼义之国,习于人伦,即布衣编氓,途巷相遇,无论期功强近、尊卑少长以齿。以其遗俗醇厚,而揖让之风行,故以久特闻贤于四方。”¹在文化上,徽州宗族社会形成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变迁的过程。宋代淳熙《新安志》的作者罗愿构画了徽州文化变迁的大致走向:“其(新安)人自昔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其后寔有文士。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歙风俗礼教考》中有相近的记载:“若文艺则振兴于唐宋……而元明以来,英贤辈出,则彬彬然称东南邹鲁矣。”在科举与理学上,徽州被称为“故文献国”、“朱子阙里”。

徽州社会以其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造成了一个特有的区域社会生活体系:徽商、徽州宗族与科举理学始终处于互动互补的状态中。中原士族在徽州复制的宗族生活,是酿造程朱理学的酵母;反之,程朱理学又加固了徽州的宗族秩序。新安文化的内核就是程朱理学酿造出的宗族文化。宗族为了在山地有限的生存空间里争得生存发展的权利,必得依靠科举张大门第。徽商为宗族聚居、为文教科举提供物质条件,宗族组织、宗族文化强大的内聚力又是徽州商帮特别强固、富有竞争力的内在机制。徽商借助宗族势力,获取资金和人力上的支持;借助宗族势力,建立商业垄

1 汪道昆:《太函集》卷1《黄氏建友于堂序》,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

断,展开商业竞争;借助宗法制度,控制从商伙计;借助宗族势力,投靠封建政权。徽商投资教学、培养子弟业儒入仕,正是他们成为官商、取得商业特权的捷径。¹区域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又使大多数徽商成为儒商,具有较高的商业素质。汪道昆曾精辟地指出徽州贾儒互动的关系:“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闲儒,则其躬行彰彰矣。”²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上述三要素构成良性循环系统。徽商在明清时代数百年间执掌中国商界之牛耳;徽州科举在明清与苏州并驾齐驱,成就全国府一级科举之最;徽州宗族则是“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徽州区域社会是一个独立的方言区(语言学界将全国分为8个或10个方言区),它是一个既封闭又开放的系统,崇山峻岭把徽州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使徽州区域社会系统能稳定运行,新安江、闽江、青弋江又把徽州与江南联系起来,通过商人、士子与外部世界保持密切的物质与信息交流,使徽州区域社会能持续运行。这样一个社会生活系统便是徽州区域社会的整体特征。

对徽州区域社会整体特征的揭示,不仅可以大大深化对徽商乃至徽州社会其他要素(专题)的研究,而且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虽然区域研究的方法是多元的,但对区域社会整体特征的揭示是任一区域社会研究都无法回避的。

在对徽商研究的基础上,我进而对近世中国商人进行了研究,撰成专著《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于1993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最初推出,香港中华书局与台湾商务印书馆继之出版了修订本和繁体字本。后来,北京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新的版本。本书一版再版之际正是中国不可逆

1 参拙文《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2 汪道昆:《太函集》卷55《诰赠奉直大夫户部员外郎程公暨赠宜人闵氏合葬墓志铭》。

转地进入市场经济的时代，正是中国商人阶层合法地登上历史舞台的过程，因而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作为第一本力图全面论述中国商人与近世社会互动关系的专著，该书先后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华东地区优秀政治理论图书一等奖，并被海峡两岸及国外一些高校列为研究生必读参考书。

二、学术理路的坚守与变通

回高校从事学术研究三十年间，工作单位凡三易，学术环境多有变迁，所研究的课题也随之有变，然而我的学术理路始终不变，对学术前沿的追求也始终不变。在安徽师范大学期间，我主要从事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1994年回到故乡苏州大学工作后，我开始思考以新的课题来适应新的环境。我没有简单地另起炉灶，而是寻求变中之不变，延续乃至强化我的研究理路。在从事徽州区域史研究时，我并没有画地为牢把学术视野局限于徽州区域内，而是提出了区域社会的研究必须要超越疆界。每一个特定区域的研究，都存在一个小区域与大区域的关系。这个大区域其实就是小区域的集散效应圈。我在界定徽州区域的集散效应圈时就认为，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徽州本土是它的核心层次；中间层次涵盖沿长江、运河的市镇农村，其中心区乃是无徽不成镇的江南；外围层次则遍及全国远至海外。三个层次互相作用，应当注意其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果说核心层次是小徽州的话，那么中间和外围层次可称之为大徽州。这样一来，就把徽学区域研究纳入了徽州社会系统与环境互动的框架之内，把单一、静态、直观的研究变成了整体、动态的研究。在区域

与其环境互动的研究中,区域比较是其中的一类。一般意义的区域比较研究,并不一定要求两个区域之间有直接的互动关系,比较它们的异同、区分区域发展的类型,也可以为我们探讨区域发展的特征和规律提供有益的思考,在这方面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历史学者做了很好的工作。¹在区域比较研究中,最具难度、最有挑战性的是两个具有互动关系的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因为研究者必须对两个区域的历史、现状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有全面把握与深入研究。任何区域的发展都不可能孤立,必然会与其他相关区域发生人员、经济、文化等的交往与互动。一方面,各个区域的地理、物产、区位、交通、文化乃至经济社会结构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苏州与徽州虽同在江南,其地理、区位却迥然不同。苏州东有大海,西有太湖,运河傍城而过,乃长江冲积平原和太湖水网平原地区。江南大运河开通后,优越的区位和地理条件使苏州成为唐朝江南的雄州。宋时,全国经济重心南移,“苏常(州)熟,天下足”,苏州被称为“天堂”,逐渐成为江南经济文化的中心以及全国财货集散、转运和信息交流的中心,有状元、优伶为苏州土产之说。徽州则由于地理闭塞、物产瘠薄,只有用当地山产竹、木、茶、漆及新安四宝笔、墨、纸、砚来换取粮食,因而徽州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要之,宗族与徽商可以说是徽州的两大土产。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的互动互补也是各区域形成并保持这些特点的必要条件。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内涵与变迁规律,只有在区域比较中才能凸显出来。因此区域互动关系的研究必将把区域研究引向深化。有鉴于此,我于1998年申报了国家社科规划项目《16—19

1 代表作有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彭慕兰的《大分流:中国、欧洲和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世纪苏州与徽州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差异的比较研究》。选择苏州与徽州进行比较研究也是与我个人的学术积累相联系的,我曾参与编纂或主编了《明清徽商资料选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江南区域研究论著目录(1900—2000)》等,这些学术积累使我有可能会从事这两个区域的比较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苏州与徽州——区域互动与社会变迁(16—20世纪)》一书200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于次年评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0年初我由苏州大学调至上海师范大学,一方面继续进行原有的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并申请了新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权力下的乡村统合——16至20世纪徽州乡村社会权力关系研究》;另一方面则开始进入区域文化社会史研究的领域。作出这样调整的理由有二:一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史在与社会学、人类学、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结合过程中实现了“范式转换”,新文化史应运而生,影响渐及法国、欧美等地。几乎同时,台湾地区的史学研究也开始了“新文化史”的转向。顺应国际学术潮流这一变迁,中国大陆也已开始了文化社会史研究的探索。二是我找到了江南区域文化社会史研究的切入点。我在为家父唐耿良先生整理回忆录《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评弹与江南社会血肉相连的关系。评弹通过“走码头”联系着江南城乡每一角落,近代更由苏州走进大都会上海,成为苏州与上海这两个不同类型城市间的文化纽带。评弹是上海多元文化中显著的一元,20世纪三四十年代借助广播,更是成为上海城市的背景音乐。我希望在研究工作中能找到社会经济史与社会文化史相融通的方法。为此,我申请了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重点基地重大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评弹与晚清以来上海都市文化圈》。目前已组织了研究团队,计划推出《评弹与江南社会研

究丛书》，以开拓历史学研究评弹的新领域。评弹从苏州到上海，我找到了这两个城市间社会文化联系的切入点。同样，在做《国家权力下的乡村统合——16至20世纪徽州乡村社会权力关系研究》课题时，我把对徽州乡村权力关系的研究放在大徽州的视野中，在大都会上海与山区村落之间寻求它们的互动对乡村权力关系的影响。上海档案馆存有大量徽州旅沪同乡会的资料，这些资料披露了近代以来，当乡村自治趋于衰落时，城市自治体开始生长，同乡会便是其中之一。同乡会的经济力以及政治干预力，使乡村在经济凋敝、烽火连天的艰难岁月保持了自治的格局。从徽州、苏州到上海，从社会经济史到社会文化史，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三、不断开拓区域社会研究的新史料

区域社会整体研究与以政治史为中心的传统史学研究有着极大的差异，这不仅表现为二者研究对象的不同，也表现为所用资料的不同。区域整体研究的资料在我们所熟悉的正史中往往所见不多，需要另辟蹊径去广为搜求。为了重现区域全面的历史，我们需要区域全面的资料，包括书面的、口述的、实物的，等等。徽州保存着异常丰富的历史资料，尤其是中国传统社会后半段的资料，这是徽学得以成为一门学科的基础所在，也是徽学的价值所在。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曾经主编或参编过多本资料集，第一本就是《明清徽商资料选编》（1985年由黄山书社出版），这也是有关徽学的第一本资料集。

徽州商人研究最大的困难便在于资料的匮乏。自古以来，商为四民之末，在传统史学领域里，商贾市井之辈是没有一席之地的。有关商人

的零星资讯，分散在族谱、方志、笔记、小说、文集、碑刻、文书、档案之中。族谱、方志中的资料分散开来看不易发现它的价值，集中起来分类排比就能看出问题来。族谱中的人物志、家传、寿序、行述、行状、圻志、墓志铭，方志中的风俗、人物类下的义行、孝友、乡善、尚义、笃行、儒行、宦行、文行、质行等，都收有商人的传记。省府县志外，乡镇志的记载往往更为翔实，如《岩镇志草》《丰南志》《沙溪集略》《澄阳散志》等。一些文集中商人的传记或资讯也较为集中，如汪道昆的《太函集》、李维桢的《大泌山房集》、许国的《许文穆公集》、赵吉士的《寄园寄所寄》、许承尧的《歙事闲谭》等。明清笔记小说如三言二拍、《型世言》《儒林外史》《古今小说》中有不少徽商的故事，当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20世纪80年代初，我和研究室的同事们决定从徽商专题入手，做基础的资料工作。我们南下北上，冒寒暑、舍昼夜，到徽州及各地图书馆、博物馆搜集资料。当时条件有限，资料全凭手抄。虽谈不上风餐露宿，但住的是简易旅舍，吃的是冷饭冷菜。经过数年的努力，抄得近百万字资料，并从中摘出40万字，编纂成《明清徽商资料选编》。该资料集将徽商资料分为七个类别：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徽商资本的来源与积累；徽商经营的行业；徽商的活动范围和经营方式；徽商资本的出路；徽商的政治态度；徽商与学术文化。每一类别再加细分，如“徽商资本的出路”下又分为：购置土地、助修祠堂书院、助饷助赈、兴水利筑道路、抚孤恤贫等义举、奢侈性消费、投资产业。无需多加一字，读者从集中起来的徽商资料便可窥得徽商的概貌。这是徽学的第一本专题资料集，它为徽商乃至徽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被评为全国优秀图书二等奖、安徽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受到了海内外同行的欢迎和好评。在搜集资料的同时，一批徽商研究的论文问世了。多年来我在《历史研究》发表论文和评论8篇，其中有关徽

州区域社会研究的有6篇。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虽然为徽商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资料,但在进行每一具体专题研究时,还必须进行专题性的民间资料的搜集。这里以徽州方氏的研究为例作一说明。徽州方氏是我重点解剖的一个宗族,我曾到徽州各县以及浙江淳安等地进行过实地民间资料的调查,访得乡民家藏的方氏族谱数十种以及祭祀簿等珍贵资料。说起这次调查的缘由也十分有意思。作为徽州望族的方氏从未引起历史学界的注意,引起人们注意的倒是方氏的一个叛逆者——北宋末年的方腊。在建国后的农民战争研究热潮中,方腊起义也是热门话题之一。重提方腊是在“文化大革命”末期的1975年,毛泽东就《水浒》发表谈话,说:“《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一时方腊名声大振,成为坚持革命的典范。但方腊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一个农民起义领袖,居然长期以来被史学界认定为是出身于“家有漆林之饶”的“中产之家”,“又为里胥”,这样的阶级根源,又怎能与坚定的农民革命立场相联系呢?在血统论甚嚣尘上的时代,有必要为其正名。于是地处皖南的安徽师范大学便把为方腊正名的使命担当了起来。不仅要搞清方腊的出身,还要搞清他的籍贯。方腊究竟是皖南人还是浙江人?这也不是小问题,在那个时代,农民起义领袖便是乡贤,一方的光荣自然不能轻易让人。要搞清方腊的身世,最有说服力的资料当推方氏族谱了。1976年,该校历史系组织数十名师生,经历数月时间,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到方氏聚居的歙县、淳安等地乡村搜集方氏族谱,并根据调查所得的材料,撰写文章并出版了《方腊起义研究》一书。今天看来,关于方腊身世之争已是过眼烟云,孰是孰非完全可以通过历史学的方法心平气和地加以考证,重要的是当年开展的关于方腊家世的调查和对于方

氏族谱的搜集,为今天的民间资料的搜集提供了线索。我在安徽师范大学服务期间与学术前辈万绳楠、杨国宜两位教授结为忘年交。他们均是当年方腊的调查者。承他们不弃,向我提供了当年借调方氏族谱的记录,其中有族谱收藏者的地址和谱名,共计 54 部。重提这段往事,是想说明民间资料的搜集并非易事,是要花大力气的。即使是对一个家族的调查,靠个人的力量也是困难的。但是深入下去,由此及彼,往往可以有新的发现。古祠残壁下的一块断碑,山村野老的一席口谈,或许能帮你解除旧的疑惑,带来新的思维,从而更加贴近社会生活的实态。

在苏州大学工作期间我和王国平教授共同主编了《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资料集》。这是苏州与徽州比较研究的中期成果,并为《苏州与徽州:区域互动与社会变迁(16—20世纪)》的完成奠定了资料的基础。《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是关于苏州的第三本碑刻集,收录碑文计 500 件。此前的《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共收碑文 370 件,其中苏州为 322 件,占全书的 86%。《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则收碑文 258 件(其中一百余件与《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重复)。三书共收苏州碑刻近千件。苏州碑刻之多,是与明清以来苏州的地位相应的。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自古以来人文荟萃,经济繁荣。经济与文化的相互作用,使苏州的社会生活瑰丽多彩,其社会变迁往往得风气之先。遍布古老苏州大街小巷的碑刻,虽然已经斑剥陆离,字迹漫漶,但是却留给我们大量的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的信息。回顾搜集、整理、标点、校勘的艰难过程,不禁感慨系之。我们曾顶烈日、迎朔风,奔走于江南市镇,穿行于深巷古宅,查找历史的印痕;我们曾踏雪登上白鹤岭,察看天主教墓地,细辨南怀仁的墓志铭;我们曾来到浩瀚的长江口,在郑和出海处的天妃宫,寻觅当年海商留下的文字。我们这本碑刻集与先前两本碑刻集不同之处便

在于取材不再囿于经济史领域,而是以更为宽广的社会史视野来审视、取舍。这本碑刻集对于我来说还有两点特别的意义:一是第二本工商碑刻集是由我的老师洪焕椿先生主编的,我做的第三本碑刻集本身就有继承的关系;二是苏州是我的故乡,出生后我在苏州生活了五年,天命之年我回到苏州工作的时间也是五年,碑刻集是我献给故乡的一份薄礼。

转入上海师范大学的十年,在资料工作方面做了两件事:一是与著名的江南史研究专家、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忠平先生合作主编了《江南区域史论著目录(1900—2000)》。我们认为中国史学源远流长,特别以原始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运用见长。这一学术传统也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历史学科的发展。江南地区各类史料浩如烟海,研究江南区域史的学者不仅要对这一地区的文献口述史料继续进行深入的探索,还需要对现有的史学研究成果进行概括提炼,并进而发展出立足于本土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研究江南地方历史的学术潮流,兴起于20世纪初期。江南是魏晋隋唐以来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心,对全国社会政治变迁有深刻影响,因而这一地区也是近百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焦点。20世纪的学者已对江南的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并为我们将来在此领域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编辑《江南区域史论著目录》不仅是要对以往的江南地方史研究作一回顾,更希望此编能够成为未来江南学发展的一块基石。这项编辑工作早在1987年就在忠平先生的主持下开始进行,21世纪初他回国访问,商定由我们共同来完成这一浩大的工程。2007年《江南区域史论著目录(1900—2000)》由北京图书馆出版。二是编纂评弹与江南社会资料集。关于评弹的资料过去已有累积和出版,但多是从曲艺剧种或艺术史的角度来选材的。我们从历史学的角度,以评弹与江南社